

全国脱贫攻坚题材 舞台艺术优秀剧目展演开幕

据中新网,由中共中央宣传部、文化和旅游部、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共同主办的全国脱贫攻坚题材舞台艺术优秀剧目展演于近日在京开幕。

本次展演历时两个月,聚焦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主题,用文艺的形式宣传、展示脱贫攻坚取得的重大成就以及人民群众的幸福生活。参演的67部舞台艺术作品,涵盖戏曲、话剧、歌剧、舞剧、音乐剧等多种舞台艺术形式,具有较高思想性、艺术性。其中,既有民族歌剧《扶贫路上》、歌舞剧《大地颂歌》、儿童剧《萤火虫历险记》、越剧《山海情深》等今年新创作品,也有民族歌剧《马向阳下乡记》、话剧《闽宁镇移民之歌》、评剧《藏地彩虹》等经过观众与市场检验的精品佳作。

抗疫题材民族歌剧

《天使日记》在武汉首演

据新华社,由湖北省歌舞剧院创作演出的抗疫题材民族歌剧《天使日记》近日在武汉首演。该剧通过讲述白衣天使的战“疫”故事,弘扬“生命至上、举国同心、舍生忘死、尊重科学、命运与共”的抗疫精神。

歌剧《天使日记》为文化和旅游部2020-2021年度“中国民族歌剧传承发展工程”重点扶持项目。该剧以小视角展现大情怀,聚焦抗疫最前线的普通护士、医生和他们的家人,用护士兰兰之念的“疫”日记串联剧情,剧情通过塑造以“兰之念”“方医生”“黄鹤”等为代表的曾为湖北抗疫拼搏奉献的医护人员形象,真实反映了白衣天使逆行出征的感人事迹。

天津大运河

遗产考古勘探

发现古代墓葬800余座

据中国新闻网,天津市文化遗产保护中心近期组织完成了对天津市西青区杨柳青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文化小镇建设项目区域大规模考古勘探,发现古代墓葬800余座。初步推测,墓葬的年代涵盖宋、金、元至明清不同历史时期。

据了解,这批墓葬中既有砖室墓,又有土坑墓;既有圆形墓,又有方形墓;既有中小型墓,又有大型墓,且埋藏深度不一。根据天津及周边省份相近类型墓葬考古发现对比分析,墓葬的年代上限应始于晚唐五代,下限止于明清时期。经国家文物局正式批准,天津市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已对此次勘探发现的100余座明清墓葬进行了考古发掘,目前已出土釉陶罐、白瓷罐、钱币等文物200余件,同时对墓葬出土人骨标本进行了全部科学采集。

自2004年开始,天津市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与中山大学人类学系等单位合作,启动了天津明清人骨保护与研究,目前已采集明清时期人骨标本逾700例,初步建立起了华北地区最大的明清人骨标本库。天津市文化遗产保护中心考古发掘现场负责人尹承龙表示,天津地区已经建立的明清人骨标本库标本多集中于蓟州区等北部地区,天津海河以南地区大规模发掘明清墓葬较少,因而缺少这一区域人骨材料积累。此次发掘人骨数量在200例左右,这批人骨的科学采集在进一步丰富天津明清人骨标本库的同时,为进行下一步人骨综合对比和深入研究,提供了难得的天津南部样本。

“世界最大”

未必能成文化地标

据广州日报,近日,有网友航拍88米世界最大苗族女神仰阿莎雕塑,该雕塑位于贵州剑河县,共耗资8600多万元。据悉,剑河县曾为国家级贫困县,于2020年3月3日退出贫困县序列,有网友质疑该雕塑系“形象工程”,不如将资金投入扶贫。

事实上,最大苗族女神雕塑并不是个例,不少地方都热衷于兴建打着“最大”“最高”旗号的文化地标。这类建筑初看或许很震撼,但细细品之却难见历史文化底蕴。针对这些现象,住建部在今年9月发布了《关于加强大型城市雕塑建设管理的通知》,明确要加强雕塑的管控、管理和审查。

应该说,各地兴建文化地标确有需求。作为文化名片,文化地标可以更好地传播城市形象,并带动城市经济发展。但文化地标并非孤零零的存在,只有它与周围的环境相融合时,才能展现出地标的魅力。生活是文化的土壤。有生活感的文化才让人觉得舒适。任何有活力的文化必然是源于生活,又与生活交融在一起。说到底,一座城市的文化地标要与其城市规模、城市文化、市民需求相适应,与人文景观、自然环境浑然一体,才能给人以美的享受,才能真正成为城市实力的象征,体现一座城市的精气神。

龙门石窟

考古发现唐代塔基

据新华社,近日,在龙门石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二十周年学术交流大会上,洛阳龙门石窟研究院发布一项重要考古成果:通过对唐代皇家寺院香山寺遗址的首次大规模发掘,发现了较高规格、较大规模的塔基。结合文献资料,初步推测为唐代入华印度高僧地婆罗塔塔基。

香山寺是唐代著名的“龙门十寺”之一,武则天敕令创建。寺院遗址位于龙门东麓,现存面积4万多平方米。此次考古发掘出唐宋时期的建筑基址和道路,以及包括唐代的塔基基址、地宫、砖铺面、散水、台基等重要遗迹,还出土了舍利函、石造像、大型刻花纹石条、刻石残块、砖瓦、瓷片、铁钉、鎏金小铜佛像等重要遗物。此次考古发掘发现了较高规格、较大规模的塔基,结合文献资料,初步推测为唐代入华的印度高僧地婆罗塔塔基。龙门石窟研究院院长史家珍说。(口记者 刘一颖 整理)

辅导孩子功课,古人愁不愁?

文化观察

□ 本报记者 田可新 本报实习生 魏一然

给孩子辅导功课,是一种怎样的体验?不少家长会以“过来人”的身份告诉你,这感觉“很酸爽”,会“出离愤怒”,会“越骂越气”。教育学家和心理学家都表示,这是方法不得当,得“稳住情绪”,切莫焦虑。其实,我们大可以回望历史取取经,感受古时“学前教育”“基础教育”的别样风貌。

“背得熟”就“学得好”

谈“家教”,先从入学讲起。在古代,冬天才是“开学季”。因为那时,正值农闲。崔寔《四民月令》记载,汉代学生在“十一月砚冰冻之时”以及“正月农事未起”“八月暑退”这三个时间入学。到了南北朝,冬季入学就成为主流。宋代陆游《冬日郊居》中写道“儿童冬学闹比邻,据案愚儒却自珍”,并为此注释:“农家十月,乃遣子弟入学,谓之冬学”。由此可见,此时儿童入学,天已渐寒。由于物质条件的匮乏,古代学生求学的艰辛甚于当今,在著名的《送东阳马生序》中明代的宋濂就记述了他冒雪前行的上学经历:“当余之从师也,负篋曳屣,行深山巨谷中,穷冬烈风,大雪深数尺,足肤皸裂而不知……”宋濂最终成为明朝开国文臣之首、明初诗文三大家之一,这么看来,定与他早年求学的刻苦、治学的专注不无关系。

为了让孩子重视学习,古人入学也“仪式感”满满。他们会举办“开蒙礼”“开笔礼”,营造一种尊师重教的良好文化氛围。这种礼数延续到今天,成了不少地方、不少学校举办的“人生第一课”。记者参加过济南南方双语实验学校每年为一年级新生举办的“开笔礼”。学生着汉服肃立,须“正衣冠”“鞠躬行礼”“朱砂开智”“名师开笔”“诵读经典”……

上学入门,哪有不难的。现在的部分家长,会因为娃娃学拼音“卡壳”着急。可古时候尚无拼音这条路可走,先人们更是绞尽脑汁想办法完成发音及识字的教学。他们不断地推演出“读为”“读若”“重文重言”“如字、破读”“亦声”“形训”“直音”“反切”等不同方法。而且,早在西周时期,我国就有了蒙学教材——《史籀篇》。它按照意义关系编排,四字一句,编成韵语,是识字教材范本。秦统一全国后,李斯作《仓颉篇》、赵高作《爱历篇》作为儿童识字读物。到南北朝时有了《千字文》,后又出现《三字经》,直到今天仍是幼教经典。而且,古时教学资源稀缺,长时间以来“认读识字”是蒙学教育的主要甚至唯一内容。一直到了经济繁荣、思想开放的盛唐,才从单纯的认读识字扩充为百科全书式的教学。教材涉及生活常识、社会知识、道德品质诸多方面,教学内容也包揽文学、地理、伦理、饮食起居等等。

而判断是否好学生,古人常看其“诵读力”,对于不少经典,学生老师都是靠朗诵、记忆的方法将知识记在脑子里,不少典籍也由此传世。而稚子善诵读,定能获褒奖。“药王”孙思邈七岁入学已能“日诵千余言”,当时的洛阳总管独孤信看到他不禁称赞“此圣童也”。宋代著名文学家和书法家黄庭坚五岁时,就能背诵五经。对于《春秋》,他甚至“十日成诵,无一字或遗”,令人啧啧称赞。而背诵也是古人看来的最好学习方法之一。“读书百遍,其义自见”“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做诗也会吟”……都是这个理儿。元初教育家程端礼在《读书分年日程》



还就此有精讲——读书自须成诵,熟读而未能精思者有之矣,未有不能记忆而能有得者也……看读百遍,背读百遍之法,似乎迂苦难行,不知百遍之功,中材皆能熟记,背读百遍,尤能牢记,不至趁口读过,亦收放心之一法也。又复连前带背,每日温背,不费工夫,温书虽多,无虞难遍,是虽勤苦于前,而终得收效于后也。 书画家、文学家丰子恺在《我的苦学经验》一文中也介绍过自己的“二十二遍读书法”——第一天读第一课,读十遍,每读一遍画一笔;第二天读第二课,亦读十遍,继续又把昨天所读的第一课温习五遍;第三天读第三课十遍,继续温习第一、二课各五遍;第四天读第四课十遍、第二、三课各五遍,第一课两遍……这样下去,到第四天,画的笔画恰好凑成一个整体的“读”字,共有二十二笔,故每课共读二十二遍。“这办法有些好处:分四天温习,屡次反复,容易读熟……如法读下去,前面的各课自会逐渐地从我的唇间背诵出来,这在我又感到一种愉快,这愉快也足可抵偿笨读的辛苦,使我始终好笨而不迂。”

古代“家长陪同受罚”

古时候有没有作业呢?以科举制诞生后来说,温习功课,重在“读”与“写”。这可都有规范可循,有标准可依。南宋学者、理学家朱熹写的一篇启蒙读物《童蒙须知》(又做《训学斋规》)讲得就十分明白。他说,“凡读书,须要读得字字响亮,不可倒一字,不可少一字,不可多一字,不可倒一

字,不可牵强暗记。只是要多诵遍数,自然上口,久远不忘……凡写字,未问写得工拙如何,且要一笔一画,严正分明,不可潦草。凡写字,须要仔细看本,不可差讹。”这是对“质”的要求。体现在“量”,《宋会要·崇儒》有规定:“(国子监)小学生八岁能诵一大经,日书二百”;“十岁加一大经,字一百”;“十二岁以上,又加一大经,字二百”。 讲到这里,还有件趣事。20世纪60年代,在新疆的阿斯塔纳古墓,出土了一份作业,它是由数幅麻纸粘裱而成的纸质长卷,抄写的是《论语》。卷末的文字表明,这卷《论语郑氏注》是唐代景龙四年写的,写书人是“西州高昌县宁昌乡厚风里义学生卜天寿”,时年12岁。最有趣的是,这位少年虽工工整整地完成了抄写,却在结束之时,抱着一份“不甘心”写下一首“打油诗”——“写书今日了,先生莫戒(嫌)池(迟)。明朝是贾(假)日,早放学生归。”有了错别字“加持”,少年小小的怨念显露无疑。想必今天的孩子读到这句话,也会“心有戚戚焉”。

“考考考”永远是“老师的法宝”。检验学习效果,古时就有“日考”“月考”“随堂考”等等。到了明朝,有“朔望日考试,分等第,行赏罚”一说,想想也是压力山大。考得不好,惩罚是少不了的。在古代,打板子、抽鞭子、罚跪,对于学不好或不认真的学生如同家常便饭。体罚,在古代叫“挞罚”,在汉代流行,到明代愈加加重,在乡村小学极为普遍,严重时连学生家人都跟着受罚。明黄佐《泰泉乡礼·乡校》

中规定“如若无故而逃学一次,罚诵书二百遍;二次,加朴杖,罚纸十张;三次,挞罚如前,仍罚其父兄。”同时,也有的老师很人性化,明代的理学家沈鲤就为“三好学生”开“免打条”——“学生勤学者、有进益者、守学规者,给免帖一纸,遇该责时,姑免一次。”而在中国古代,“请家长”的现象已经出现,明代良吏叶春及在惠安办学时就要求长辈“轮笃实老成者二人,平旦坐左右塾,以序出入”。

如今,线上线下家教班大热,家长们对各种课外辅导班十分热衷。其实,古代就有考前辅导。针对科举考试,书院和文社应运而生,往往是大户人家出资兴建,请来饱学鸿儒来“划重点”“押题”。根据邓洪波教授《中国书院史》的统计,宋代书院总数有数百所之多。相关数据库显示,书院的位置和考试中取得功名的人的地理分布也有关联,形成“有书院的地方科举考试的成绩好,科举考试成绩好的地方书院市场大”的良性循环。

看看“别人家的教育方法”

当然,“由苗成材”,最需优良家风的浇灌。古代也有“别人家的孩子”,其背后还“藏”有“别人的教育方法”,值得我们细品。

讲起“优秀家长”的典型,元代戏剧家关汉卿曾在他的杂剧作品《陈母教子》中刻画了一位传奇母亲——陈母。《陈母教子》全名为《状元堂陈母教子》,是根据宋代阆中陈氏状元兄弟的事迹演绎而成。历史上,陈家寓居济源期间,三个儿子就读于延庆寺(龙潭寺),相继中进士。长子陈尧叟、三子陈尧咨名列榜首,是为状元。父子四人同朝辅政,陈尧叟、陈尧佐均位列宰相。故有陈氏一门“三进士”之称,成为中国历史上鲜有的官宦家族奇观。现在阆中的大像山尚存有状元洞,城内有“三陈街”“状元坊”等遗迹。

剧作《陈母教子》以“埋金”“逐子”“招婿”“杖责”等为主要故事情节,彰显了陈母教子的良苦用心——她始终向孩子们强调读书立志的重要性,未等儿子们入试就选好了状元堂,督促孩子学习;她坚持“立德树人”,劝诫儿子们绝不能只追求功名利禄、做人必不可少的是高尚品德、正直诚实……剧中的楔子就设置了这样一个桥段,陈母家从墙角处刨出一窖金银,儿子们认为是“天赐予俺的钱财”,高兴极了,陈母却命令他们埋覆如故,并由此教育三子说,“欲教汝为大贤。”而在陈母的教育和督促下,三个儿子日夜攻读、学业渐长,相继登科、接踵为相。后来,老三良佐衣锦还乡时,接受了迎接的百姓送的锦缎,回家想送给母亲做衣服。不想他不仅未讨得母亲欢心,陈母还因他“未曾为官,先受民财”生气杖责,直打得他“金鱼坠地”(金鱼指鲤鱼状金符,为官员所佩)。虽说情节有所虚构,但不贪意外之财,不受百姓之礼,不以家富而费侈,不以身贵而不恭谨事亲等教导,仍值得现代家长借鉴学习。

言至于此,忽而发现,加强国学教育或许也是涵养良好家风、助力孩子成才的有效途径之一。在警句箴言中知礼仪,在经典古籍中学习方法,不正是自古传下来的教学智慧吗?而在与孩子共同的学习交流中,或许家长也能够开眼界、修心性、敛脾气、获新知。当然,这个过程依旧要讲求守正创新。在日前召开的山东省中华诗词教育学会《国学萌娃乐学读本》系列丛书编写论证会上,不少专家都建议,开展国学教育,传承传统文化,可采取绘画、音乐、游戏等孩子们易于接受的形式,用贴合少年儿童思维方式和兴趣的方法开展教学,要共同参与学习,更得通过言传身教来交流理解、传递价值观念。这其实也是对家庭教育科学性、持续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郑板桥“难得糊涂”在潍坊

□ 本报记者 张依盟

“聪明难,糊涂难,由聪明而转入糊涂更难。放一著,退一步,当下心安,非图后来福报也。”

提起扬州画派的代表人物郑板桥,人们很容易想起他的名言“难得糊涂”。在潍坊市博物馆有一块郑板桥的“难得糊涂”碑,下方就刻着这几行小字。石碑深受游客喜爱,由此开发的文创产品也备受追捧。

那么,这块碑为何在潍坊? 郑板桥,名燮,字克柔,号板桥,江苏兴化人,“扬州八怪”之一。家在城门外,薄有田产。祖父为廪生,父亲教授书馆,算是耕读之家,书香门第。郑板桥活动的时期正值史家所称的“康乾盛世”,他抱着“得志泽加于民”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理想走上仕途,成为康熙秀才、雍正举人、乾隆进士,并于山东范县、潍县做邑令十一年,他勤政廉明,爱民如子。特别是在潍县任上,

为救民于倒悬,他“设粥厂、捐廉代输,开仓赈灾、以工代赈”,千方百计解救灾民,留下了不少佳话。《清史列传·郑燮传》称:“有循吏之目”。

郑板桥的为官理念也渗透进他的艺术作品。著名的“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便出自郑板桥的书画作品。

郑板桥的诗书画,人称“三绝”。他的诗文,直抒血性,同情人民,鞭挞丑恶,像《逃荒行》《还家行》《思归行》,堪与杜甫的“三吏”“三别”相媲美。他的书法,怒不同人,独创一格,以隶楷为主,篆隶楷行相参,并杂以兰竹画法入书,自称“六分半书”。他的绘画,师法造化,继承传统,多绘兰竹石,尤精于竹。画兰,秀叶疏花,极具姿致;画竹,潇洒劲秀,形神俱足;画石,峭拔瘦硬,昂然向上。再配以点睛之题跋,极富哲理,有“郑竹、郑兰”之誉。

潍坊市博物馆收藏的《峤壁兰图》(左

图)是郑板桥传世作品中尺幅最大的。画面左上角是大面积的悬崖峭壁,在石缝间有五丛兰草,右下角是散石一组,兰花两丛。画面构图和谐灵动,兰花的出尘之美与峭壁的古朴凝重相得益彰。题画诗“峤壁兰垂万箭多,山根碧蕊亦婀娜。天公雨露无私意,分别高低世为何”,借物喻人,表达了对人世不公的反思与追求平等的渴望。

专家认为,综观板桥之人为政为文为艺,“立功天地,字养生民”是他人生的价值追求;“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是他忧国忧民的人本情怀;“删繁就简三秋树,领异标新二月花”是他不同流俗的艺术风格;“淡如我辈成胶漆,狂到狂奴有性情”是他与“八怪”等好朋友的个性张扬。

正如国画大师徐悲鸿所赞许:“板桥先生为中国近三百年最卓绝的人物之一,其思想奇,文章奇,书画尤奇。观其诗文与书画不仅相见高致,而且寓仁慈于奇妙,尤为古今天才之难得者。”

文物志 镇馆之宝

